

反思发展研究： 历史渊源、理论流派与国际前沿

李小云 徐秀丽 齐顾波*

摘要：近年来，有关“发展”的研究与教学骤然升温，呈现出国内与国际视角、政府与学界视角、官方与民间视角，以及不同学科视角等混杂交错、激战辩论的盛景。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发展研究的历史脉络、理论流派及与中国发展实践之间的联系进行阐述，并对发展研究当前的国际热点和未来态势作了简要的评述。本文指出，发展研究深深嵌入现代社会对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探究的学术传统之中，而现代发展研究从本质上涉及到了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现代性的国际体系。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发展研究学界正构建着新的知识创新体系以应对由内在国际权力结构重塑而带来的挑战。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参与和贡献必将深刻地影响着发展研究体系的未来。

关键词：发展研究；现代性；资本主义；知识创新

一、引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来，“发展”不仅作为一种概念与理论，更是作为一种蕴含了制度、政策、技术与器物的公共工程与实践深深嵌入到现代社会的脉络之中，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一种主导性机理。近几年来，尤其随着中国作为“国际发展输出国”的角色日渐凸显，以及国内反思“发展主义”的主体逐渐多元、声音日渐加强，有关“发展”的研究和教学愈发得到重视。

正是在此背景下，什么是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以及发展研究是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开始在中国从真正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的问题，并因参与主体的多元性与探究视角的差异性而具备了理论争辩的张力。本文系统梳理了发展研究的历史脉络、理论流派及与中国发展实践之间的联系。按照发展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古典、现代和新的的发展研究三大类。在古典时期，尽管尚未形成现代意义的发展研究，但早期西方社会思想对于人类迈入现代社会后所面临的各种变化和关注的关注为现代发展研究埋下了伏笔。现代发展研究则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国际发展界，并通过国际发展援助等工具实践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发展理论思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在引入既定国际发展理论脉络“碎片”的基础上，结合具体国情，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这也是在21世纪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新兴国家自身发展路径的一个切入点(张宇燕、田丰，2010；何帆，2010；田春生、郝宇彪，2011)。这些新的理念、

*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邮政编码：100083，电子信箱：xiaoyun@cau.edu.cn；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邮政编码：100193，电子信箱：xxl@cau.edu.cn；齐顾波，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邮政编码：100083，电子信箱：qigupo@cau.edu.cn。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新的知识,以及新的联盟(比如金砖国家)挑战着自二战以来既定的发展理论和实践模式,同时又回应着古典时期人类社会对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本质的反思。新的发展研究自21世纪以来所孕育的研究框架,是基于对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批判和对单一实践方案的否定。

二、古典发展研究: 深深嵌入现代社会对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探究的学术传统之中

长期以来,在西方的语境下,“发展”与“援助”几乎合二为一,但这样的认识框架无论是在新兴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治理层面越来越受到实质性的挑战。比如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在中文的语境下,很少有人会将“援助”和“发展”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而在2011年发布的《釜山宣言》中,“援助有效性”第一次被修订为“发展有效性”,援助与发展之间的差异首次在“国际发展界”被得以公开的剥离。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还原了发展研究的本源性。事实上,发展研究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人类迈入现代社会的早期智识努力之中,并深深地嵌入现代社会学术传统之中。

初期的古典发展研究主要是指对15-16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18世纪末期的工业革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其范畴涵盖了针对自启蒙主义以来人类理性战胜宗教,并进入工业化时代展开探究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其学术起点是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变迁的关注。简而言之,古典发展研究更多地关注工业资本主义原始发生地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属于西方看“自己”的研究,这与二战后借助国际发展援助载体而进行以西方看“他人”的现代发展研究、以及由发展中国家看待“自己”的发展研究都存在差异。

黑格尔和马克思堪称古典发展理论真正的先驱者(Colin, 2005),两人都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的形成所产生的剧烈的社会变化展开了系统的研究,而更早之前的亚当·斯密及其之后的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均为古典发展理论的奠基人。黑格尔成长于欧洲快速工业化的年代,因此他的哲学思想呼应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由于当时的德国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落后于英国,因此德国普遍关注自己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而黑格尔的关注点就放在了人类不同的精神生活源泉与国家命运等哲学问题上。在他的理论中,现代性的“星丛”、时间意识和理性等这些概念第一次成为明显可见的问题。黑格尔认为,“近代”就是“现代”,标志“近代”形成的三件大事是:发现新大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大致相当于16-18世纪。而直到18世纪,这个“近代”或“现代”的概念才得以明确(赵静蓉, 2005)。黑格尔同时也关注现代理性与人性之间的矛盾。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涉及到了“反思性发展研究”的本体论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发展研究的实践遇到挑战时,很多发展理论的学者开始回归黑格尔理论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对于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既是诠释性的,也是批判性的。他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诠释继承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而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伦理中关于人类创造性的观点、并以此展开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则来源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具有扩张和集约化^①的经济发展机制,以及能够不断重建和理性化的社会发展机制。马克思发展伦理的核心是“异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生产结果看,工人与自身的劳动成果相分离;其次,从生产过程看,工人与他的生产活动相分离;再次,从人类本质看,工人与人类原有的属性相分离;最后,人们从他们的同伴中异化出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同样也涉及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在它的中

^①即向资本主义发生地之外扩张和在资本主义发生地内部的转型深化。

心区域更为密集地发展,并不断向外扩张。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外在扩张和内在集约深化的两面性在中国当前的发展过程中均能找到具体的体现,也是目前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新视角。

古典发展理论的各种思想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开始传入中国。严复从 1896 年起至 1908 年间,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①、亚当·斯密的《国富论》^②、约翰·穆勒的《逻辑体系》^③和《论自由》^④、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⑤、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⑥等。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经孙中山、蔡尔康、赵必振等人介绍到中国。应该说,西方自启蒙主义以来形成的、以人类理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终结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国开始在实践中被逐渐纳入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范围之内。

三、现代发展研究:关注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的现代性

二战结束以后,对去殖民化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研究,以所谓的“干预性变迁”理论为中心逐渐形成现代发展研究体系,这也是现在一般意义上发展研究滥觞的标志。一般认为,现代发展研究的学术领域主要形成于 20 世纪 40—50 年代(Corbridge, 1995),并可进一步区分为新古典的发展研究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研究两大阶段:其中,前者主要受到环境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主导了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发展研究;而后者则主要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导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末的发展研究。所有这些思潮都属于所谓的主流发展研究理论,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西方路径的现代化。

(一) 现代发展研究的学术与实践源起

追溯现代发展研究的学术和实践源起,就不得不提起早期人类学家的努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发展研究的形成。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一般认为主要起始于 19 世纪末期以美国的 Morgan 和英国的 Tylor 为代表的理论研究。Morgan (1877) 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原始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进化的,并且这种进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原始社会通过他们的劳动和创新所产生的“进步的”要素正是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的主要内容。社会进化论认为,野蛮人和现代人同属一类人,只不过他们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而人类学恰恰是希望通过研究现代野蛮人的社会结构来了解当初人类社会的状况,正如 Morgan (1877) 所言,“非西方社会的人或多或少就像我们的历史和经验的活化石”。社会科学使用的“发展”这个词实际上来源于生物学中的“发育”,在生物学里指群体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或者指生命个体形成完整生命功能的过程,也就是生物进化的过程。Morgan 把这个进化的概念借用过来认为人类社会也是由原始简单的低级阶段向复杂的高级阶段进化而来的。

社会进化论的线性思想直接影响了现代发展研究理论中推动不发达达到发达的政策实践的逻辑,即 Tylor 所谓之“发展的理论”。20 世纪初期美国文化历史学家 Boas 提出了文化相对论的理论,以及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的社会功能主义研究开始动摇经典社会进化论阶梯式演进的观点。他们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运行方式,或者称之为其特定的文化模式。这一思想也影响了以文化主义为主张的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批判,但是,这些所谓的后进化论主义者还是继承了他们前辈的“原始”和“现代社会”的二元观点,而且坚持人类学应该主要研究处于原始阶段的社会。

① 严复译为《天演论》。

② 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严复译为《原富》。

③ 严复译为《名学》。

④ 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论》。

⑤ 严复译为《群学肄言》。

⑥ 严复译为《法意》。

人类学不仅在认识论上对批判发展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又因为其“原始性的异域”视角被殖民主义者所利用,许多人类学家成为为殖民主义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的“国际专家”,从而使很多殖民时代的人类学背上了为殖民主义服务的罪名。人类学与现代发展研究之间的关系与殖民主义、殖民研究和去殖民化等是不可分割的。20世纪40-50年代英国相当多的人类学和社会经济学研究都是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开展的,许多为殖民当局服务的人员在去殖民化后都成为了发展研究领域中的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Kothari, 2005)。比如,为了改善殖民统治,英国政府于1937年在英属中部非洲(今天的赞比亚)成立了非洲社会研究机构,即罗得斯-利文斯通研究院(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这个研究院的一系列非洲研究奠定了应用人类学、以至今天“关注异域变迁为视角”研究框架的“发展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的学术基础,并逐渐形成了英国人类学的曼彻斯特学派;而法国殖民当局建立的“殖民学院”其后也演变为今天的“发展学院”。

(二) 现代发展研究的理论与批判

现代发展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思想来源于去殖民化之前的各种思潮,比如在理论上源于早期人类学家对于“异域”的关注,以及由此而生的西方人看待非西方世界的视角;在实践上则借助于早期海外殖民开发的实践制度和思想体制。从根本上说,现代发展研究更多地侧重非西方的变化,属于西方人看“他者”的研究。事实上,“发展研究”这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Andrew, 2006),特别是去殖民化之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均在探索如何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于是,以此为核心主题的现代发展研究也就随之诞生了(Bernstein, 2005)。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现代发展研究虽然还是基于工业资本主义变迁这个理论框架,但其关注点则转移到了工业资本主义模式如何通过有计划的干预从而有效地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现代发展研究中的新古典发展研究理论继承了以社会进化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在全球变迁扩张的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应该学习已经处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新古典发展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不足,因此,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国家最大程度地利用国内储蓄,以及利用外资从而对工业化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投资。

新古典发展研究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以发展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发展经济学思想主导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发展研究(Andrew, 2006)。凯恩斯通过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修正提出了政府在经济管理中作用的理论,并提出设立一个全球性国际基金的构想。该设想在理论上支持了增长理论、发展计划和发展干预。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哈罗德和刘易斯。哈罗德以凯恩斯储蓄投资理论为基础,进行了适当扩展,最终形成了他自己的经济增长模型。刘易斯对新古典发展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1951年撰写了一篇名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措施》(*Measure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的报告;(2) 1954年发表了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3) 1955年出版了《经济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

第二,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帕森斯等人掀起了一股用结构功能主义来研究工业社会的风气。众多学者们围绕着对工业社会本质的阐述,指出了非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路径,认为在工业主义的逻辑带动之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终将殊途同归;并且指出,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引起的冲突将会逐渐减少,未来的世界将走向共荣(Preston, 1996)。

第三,超越早期仅仅对于经济增长的关注,现代化理论开始探讨非经济因素,指出现代化是指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1952年世界上第一本发展研究的学术期刊《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问世。该刊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是Hoselitz写的《经济发展的非经济障碍》(*Non-Economic Barrier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Hoselitz 在该文中对以现代化为基础的发展做了系统的说明。他认为,以工业化形式出现的经济发展会对社会和文化结构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并不仅仅只是生产技术的进步,而且最终也是社会价值和规范的重新定位,任何对经济发展有意义和完整的分析都需要将这种分析从生产技术的进步延伸到价值的改变方面(Hoselitz, 1952)。

1950 - 1970 年期间的发展研究可以说是现代化理论主导的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以城市和工业优先的增长型发展思潮开始受到挑战。就连世界银行也不得不在促进增长的同时开始强调分配和贫困的概念。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逐渐成为现代发展研究的中心。应该说明的是这一批判并不是对发展的批判,而依然是在“发展”的框架下对于如何促进发展的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新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兴起。Frank 和 Amin 等一批学者基于对拉丁美洲发展历程的研究认为,发达的中心和欠发达的边缘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发达的中心依靠对欠发达的边缘的剥削而致富,同样,城市资本主义的繁荣则来源于对边远的外围的剥削。老殖民主义让位于新殖民主义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公司,他们通过价格转移和不平等的贸易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Frank, 1966)。

第二是对农业和农村发展(agrarian and rural development)的重新认识。在两部门发展模型中和现代化理论中,农业是一个拉现代化后腿的产业。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掌握在那些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的、各自为政的封建精英手中,这样的生产关系阻碍农业的现代化。农业应该逐步实现由封建的地主制度向现代的市场为导向的大规模农场转变,农业变革的目标是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得土地不断向大规模的土地所有者手中集中。但 Johnston 和 Kilby (1975) 的研究则认为:大型商业农场无法让贫困的农户受益,无法形成提高单位产量的技术体系,大型商业农场也无法促进能在乡村吸纳就业的产前产后体系的发育。他们继而认为,应该向日本和中国台湾那样通过平等的土地制度改革使得小农户公平地获得土地。Williams (1976, 1981, 1982) 进一步将这一讨论发展成了针对现代发展理论的、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农民研究学派。他认为农民既不是陷在传统的泥潭里,也不是理性的初级资产者,农民拯救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商品经济扩张的危机。现代发展理论主张农业规模扩大和商品化提高的同时,通过农业技术的变革来改造传统农业,绿色革命就是典型例证。Harris 等(2005) 的研究发现,基于条件相对均一的大农场条件下,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可以很好发挥作用,但在小农条件下则会出现不同的情况。Harris 和其他学者针对农业技术变化的一系列研究丰富了现代发展研究的分支——农村发展研究,他们提出了土地、劳动力、生产市场、农户生计和决策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对农户的影响。

综上所述,新古典发展理论建立在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基础之上,指导了战后欧洲的重建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战后主要福利国家陷入了危机。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干预是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自由市场能够使人类福利最大化,能够使物质利益最大化,能够确保政治自由的最大化,而且知识的运用效果也会最大化(Preston, 1996)。同时,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停滞不前和发展援助的失败,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国家对于市场的干预,以此应该消除对市场任何形式的干预,减少公共部门,发育私营经济,取消财政补贴等。这一主张导致了所谓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出台。新自由主义主张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其后的实践上均惨遭失败,但是主流发展理论又将这一失败归咎于制度问题,继而提出了影响 21 世纪国际发展的新制度主义。这样,新制度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结合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发展理论。

事实上,现代发展研究自诞生伊始就受到各种挑战,其理论流派的不断嬗变和丰富本身

就是这种批判的一种结果。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以对现代化为基础的发展研究理论的批判,这些批判受到了马克思结构主义社会学和福柯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实践中出现的“东亚发展模式”和“中国发展经验”动摇了西方发展路径的唯一性,从而形成了新的发展研究框架。此外,由于现代发展研究具有很强的、按照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思考非西方发展的意识形态,所以往往被批判为具有殖民主义色彩。

(三) 现代发展研究在中国

现代发展研究的各种思想主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渐传入国内。虽然像张培刚和谭崇台等发展经济学先驱从20世纪50年代就在中国倡导经典的发展经济学,但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特别是经典的结构主义经济学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才开始在学界和政策界受到重视并成为了指导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基础。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改善农业生产力、动用国内储蓄、借助外资和技术、发展劳动密集的工业化,以及外汇管制、进口替代的政策等都属于典型的经典现代发展研究的理论主张。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继成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官方研究机构的研究主要受到现代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其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逐渐在学界和政界受到重视。

20世纪80年代,西方出现了对统治现代发展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反思和批判,参与式发展、性别与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思潮开始成为所谓的“替代发展”路径。但这些思想在同一时期一直没能对我国的学术界和政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西方的发展思想一般来说是通过其发展援助的手段传播的,而中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接受西方的发展援助,而且即使得到了西方发展援助的支持,中国也主要利用国外的资金、管理和技术,而没有成为受西方发展思想控制的国家。因而,当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开始反思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的西方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失败的时候,中国却恰好刚刚开始学习西方现代发展研究的理论和经验。

如果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受到了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影响学界和政界。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参与式发展、性别与发展等思潮也开始进入学界和政策界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以后,伴随快速的城市化和农业人口的流动,西方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实践和研究开始进入学界,同时受Escobar解构主义思想影响,以中国发展为案例,在理论上反思或批判现代发展主义理论的后现代发展研究观点也开始在国内出现(叶敬忠,2010,2011)。

四、发展研究的国际前沿与未来:学科建制与新的发展研究亚型

现代发展研究从20世纪40-50年代形成,并于60-70年代迅速成长为一个集研究、教学和实践为一体的、新兴的、应用性、交叉性社会科学。这种迅速发展的态势主要是当时的学术和政治环境造成的(Harriss, 2005)。大量的发展研究的学术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Development and Change*》和《*World Development*》相继出版。专业化的研究机构如“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和“英国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在欧美的大学中,特别是在英国的大学中纷纷建立发展研究的教育专业。当时对于发展的研究和教学到底是放在发达国家还是放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放在发达国家,因为发展政策和援助是由发达国家制定和提供的;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放在发达国家是一种维护西方霸权的行为,应该放在发展中国家。在后一种思想的影响下,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建立了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孟加拉的达卡大学建立了孟加拉发展研究院(Bangladesh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Andy and Michael, 2008)。到目前为止,在发展研究学科建制最为完善的英国,境内共有16所大学设有系统的发展研究学院或发展研究

系,如伦敦经济学院的发展研究所(现称之为国际发展系)、牛津大学的国际发展系等,全英国已有 33 所大学设有发展研究类的教学和研究项目,全国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共有近 700 多的研究人员从事发展研究(Andrew, 2006)。

西方的现代发展研究学科体系综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专业学科知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教学和实践框架。尽管从发展研究出现伊始,针对主流发展思潮的批判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发展理论所坚持的将在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发展方面的经验普世化这一使命一直主导着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所有的争议都只不过在于如何实现这个普世化的方案而已(Brett, 2009)。这个体系已经演化成了一个精细的全球化的企业,这个企业设计了发展的政策,并负责实施发展的计划和项目。它的主要使命是参照发达国家治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原则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为这一事业的宗旨是消除现代社会中的压迫、不平等、贫困、社会动荡,因此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疑(Brett, 2009)。

然而,发展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

第一,作为任何一个学科都应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知识认同,从而与其他学科相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研究很难再作为一个可以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竞争的学术领域(Hoogvelt, 2001)。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发展研究一直没能在学科的关注点、分析的假设和实证的重点等方面与经典的社会科学相区别,同时,也没能在已有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发育出独立的分支领域。第二,发展研究院里的理论家往往把在学院里学到的主流学科的知识拿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课题。而事实上,无论是提出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的先驱们无一不强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和发达国家不一样,需要发展出针对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的政策理论(Brett, 2009)。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发展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结构化的制度变迁问题,而这一问题无论从过去的研究,还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维度的考量都相当复杂,因此形成理论和政策方案就比较困难。第三,发展研究的范式单一地追求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西方经历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来控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而实际上,东亚的发展以及过去 30 多年中国的发展都没有遵循这个模式,发展研究面临来自实践的挑战。

20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对于发展的争论开始逐渐形成了某种“共识”,新的发展研究的框架开始形成。首先,20 世纪 50 - 70 年代传统现代化方案失败的反思发育出了依附理论,但是依附理论依然是基于传统和现代这样一个结构,依然是在回答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取代传统现代化方案,这个方案的失败导致了对于“国家作用”的重新认识,而发展研究依然顽固地将反思归纳到一个新制度主义的框架下,将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联姻形成了主导 21 世纪以来的国际发展研究的框架。这个框架认为,市场的作用不可替代,但是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家机器为市场提供服务,而这个有效的国家又是基于良好治理结构的,基于法制的民主政体。西方发展援助体系自 21 世纪以来实施的“良政治理”(good governance)就是基于这个理论。然而,过去十多年,西方援助的重点——非洲的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一方案的实施而有所改善,相反,西方再一次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而并不符合西方模式的中国的经济则持续增长。

第二,新兴国家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发达和不发达的结构关系,从而使得发展的结构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失去了舞台。新兴国家在贸易、技术、投资和对外援助等方面与贫困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联合体。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西方国家最大的市场,但又受到来自西方国家高技术领域的剥削;中国同时又依赖相对落后国家原材料的供应。中国既接受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发展研究中的发达与不发达、援助与受援这些二元对立的观念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

第三,快速转型变迁的国家,虽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都出现了新的问题。传统

意义的发展问题集中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而新兴国家出现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剧烈的不平等,社会保障的缺失和环境等问题为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由于新兴国家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大多数,这就迫使发展研究将关注多数人口的贫困问题转向多数人口的不平等和社会转型,这在已有的发展研究框架中是缺失的。

第四,传统发展研究无论从其视角还是研究主题来看,都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的范式、知识的基础、资助和研究人员都是以西方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只是协助者。然而,从新兴国家对其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和本土社会科学学者的迅速成长的趋势可以看出,这一局面正在得到改变。这些研究将会得到补充,甚至改变我们对发展的认知。

第五,21世纪以来大量新的发展话语,如“经济特区”、“渐进式发展”、“发展学习”等不同于传统的“治理”、“制度”等的话语开始出现在发展研究的讨论中。针对“制度变迁”为条件的西方发展路径出现了东亚发展、特别是中国发展路径的“要素”发展路径开始受到重视。这些都需要新的发展理论的归纳和总结。

第六,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城乡不平等的扩大和小农的生计困惑,马克思结构主义、农民研究重新回归发展研究的讨论。Harris(2012)对印度农民小生产的讨论展示了全球化下小农生产的复杂性。这将使得现代发展研究必须重新审视农村发展问题,以解决小农业生产面临的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同时,又能说明现状和预测未来发展的新的发展研究范式正在孕育之中。这一新的理论主要是基于对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批判和对单一实践方案的否定。这些反思正在发展研究界形成一种新的、综合的框架:“自由制度的多元主义”(Brett,2009)。新的理论范式的发展需要对传统发展研究学院的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否则将无法创新出新的发展知识。位于英国萨塞克大学的发展研究院(IDS)正在开始所谓的新的发展知识教学体系的改革。而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研究和教学机构应该更多地总结自身发展经验,并在与历史和西方理论的对话中成为新的发展研究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何帆,2010:《G20 向何处去》,《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
2. 田春生、郝宇彪,2011:《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差异比较与评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3. 叶敬忠,2010:《发展、另一种发展与发展之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4. 叶敬忠,2011:《西方发展的西方话语说:兼序〈遭遇发展〉中译本》,《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5. 张宇燕、田丰,2010:《新兴经济体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
6. 赵静蓉,2005:《黑格尔对现代性的自识与反思》,《求索》第1期。
7. Andrew, S. 2006. "What Is Development Studie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16(6):644-650.
8. Andy, S., and T. Michael. 2008. "What Could Development Studies Be?"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18(6):755-766.
9. Brett, E. A. 2009. *Reconstructing Development The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0. Bernstein, H. 2005.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the Marxists." In *A Radical History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ies*. Edited by U. Kothari, 111-137.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11. Colin, L. 2005. "The Rise and Fall of Development Theory." In *The 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M. Edelman and A. Haugerud, 109. Malden, Oxford and Carlton: Blackwell Publishing.
12. Corbridge, S. 1995. *Development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Taylor & Francis.
13. Ferguson, J. 1990.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The Ecologist* 24(5):176-181.
14. Ferguson, N. 2003.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Penguin.
15. Frank, A. G. 1966.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6. Gluckman, M. 1949. *Malinowski's Sociological Theor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7. Gardner, K., and D. Lewis. 1996.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London: Pluto Press.

18. Harriss, J. 2005. "Great Promise, Hubris and Recovery: A Participant'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n *A Radical History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ies*. Edited by U. Kothari, 17 – 46.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19. Harris, W. B. 2012. "Capitalism and the Common Man; Peasants and Petty Production in Africa and South Asi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 109 – 160.
20. Hoselitz, B. F. 1952. "Non – Economic Barrier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1): 8 – 21.
21. Hoogvelt, A. 2001. *Glob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 World: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2. Johnston, B. F. , and P. Kilby. 1975. *Agriculture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Strategy on Late –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3. Kothari, U. 2005. *A Radical History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ies*.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4. Morgan, L. H. 1877. *Ancient Society*. Chicago: Charles H. Kerr Publishing Company.
25. Malinowski, B. , and P. Kaberry. 1945.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6. Preston, P. W. 1996. *Development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n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Change*. New York; Wiley.
27. Rist, G. 2010.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8. Shaw, T. 2004.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Unilateralism."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5(1): 17 – 24.
29. Vincent, J. 1990.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Visions, Traditions, and Trends*.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30. Wilson, G. 1941. "An Essay on the Economics of Detribalization in Northern Rhodesia(part I)." *Africa* 14(1): 45 – 46.
31. Williams, G. 1976. "Taking the Part of Peasants; Rural Development in Nigeria and Tanzania."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Africa*. Edited by C. Peter, W. Gutkind and I. Wallerstein, 131 – 154. Beverly,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32. Williams, G. 1981.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easant Problem." In *Rural Development in Tropical Africa*. Edited by J. Heyer, P. Roberts and G. Williams, 16 – 5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33. Williams, G. 1982. "Taking the Part of Peasants; Rural Development in Nigeria and Tanzania." In *Rural Development: Theories of Peasant Economy and Agrarian Change*. Edited by J. Harris 381 – 398. London; Hutchinson & Co. Zamosc.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Development Studies: Historical Origins, Academic Schools, and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Li Xiaoyun, Xu Xiuli and Qi Gub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Recently, the discussion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development along with development studies have been burgeoning in China. To bridge the knowledge gap both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and between the academia and policy maker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various academic schools, 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China's development practices. It argues development studies have been deeply rooted in the western classic traditions of social sciences with the core concern on modernity and capitalism.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development studies in modern sense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gim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o deliver their modernit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the increasing role of China, along with other emerging powers,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framework has been shaped and reshaped with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Keywords: Development Studies, Modernity, Capitalism, Knowledge Inno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Y40, Y80

(责任编辑:赵锐、彭爽)